

经典



莱斯利·马门·西尔科

莱斯利·马门·西尔科(Leslie Marmon Silko, 1948—)是当代美国本土裔作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从1968年开始的美国本土文艺复兴中脱颖而出。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典仪》(Ceremony, 1977)被视为美国文学经典中不可或缺的作品,也是当代美国环境小说的代表作之一。第二部长篇《死亡年鉴》(Almanac of the Dead, 1991)宛若一部重述500年美洲征服史的史诗性作品,内容浩瀚,交织了历史、神话、预言、文化评述等,涉及70多个关系错综复杂的主要人物。她的第三部长篇《沙丘中的花园》(Gardens in the Dunes, 1999)与《死亡年鉴》中的文化毁灭恰好相对,聚焦人们如何与世界的发展相互关联,如何在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破坏与贪欲中保存自己的文化。该书的体裁多重复杂,篇幅巨大,作家将细节融入多元各异、形象生动的故事场景,刻画出生猛独特的各色人物,展现了高超的叙述艺术。

故事发生在20世纪初,印第安沙地蜥蜴部落(虚构的部落名称)中,外祖母弗利特带着两个外孙女靛蓝和盐姐姐前往一处叫尼德尔斯的地方。在土兵击退印第安人召唤弥赛亚的幽灵舞蹈聚会时,靛蓝与家人失散,被送进一所寄宿学校。之后,她逃出学校,躲藏在白人女性海蒂家中。海蒂曾是一位女学者,她关于早期基督教女性角色的论文被校方拒斥,为此郁郁寡欢,嫁给了植物学家爱德华。爱德华家道中落,想通过走私植物,满足殖民者对物种收集的贪欲,重建家业。海蒂收留了靛蓝,对她关怀备至,带着她随丈夫进行了一次夏日旅行,参观了美国东海岸和欧洲各处。期间,海蒂指导靛蓝阅读,让她对艺术、旅行发生了兴趣,靛蓝对大自然本能的热爱和敏锐的感受也影响着海蒂。靛蓝思念印第安家人,一心想回到姐姐身旁。海蒂自己也在旅行中认识到独立和自由的重要性,并决定帮助靛蓝找到家人。

西尔科通过旅行及人物间文化和情感的交融,尤其是通过园艺这个真实而富有隐喻的载体,打开了文化嬗变的画卷,为读者提供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印第安人收集物种,杂交植物,欣赏不同生命彼此吸纳杂糅、共同发展的生活方式,尊重所有生命独立的精神和个性。相比之下,新英格兰白人则崇尚奢华园林和丰富的物种,并不择手段地猎取新品种,进行移植培育,通过土地开发、征用、驱逐本土居民、焚烧丛林,甚至偷取物种等行为,来不断积累、扩张、垄断。从靛蓝、乡亲和朋友的生活经历,以及海蒂的早期学术生涯和婚姻生活中,读者也看到了西方父权体制中,女性、土著民族、大自然、动植物等被压抑、统治、剥削、开发的普遍现象,这与拉古纳人母

莱斯利·马门·西尔科:

# 行进与交融中的文化嬗变

□张 琼



《沙丘中的花园》英文版

然的再现,给世界带来了新的视角,而《沙丘中的花园》为美国文学的土地想象开启了新的篇章。

小说中,人物不断行进,场景始终变化。小说中的旅行就是人物接触、了解不同文化的过程。这种主题和创作风格,符合西尔科一贯的相异文化交融的创作主旨,也是她关于印第安文明和欧美文化之间融洽、互利、共存的深入探究。

西尔科保持自己混血个体的优势,在文化内外不断移转调换,承担重要的叙述、传递、沟通作用。在海蒂、靛蓝、爱德华的旅行和风景变迁中,读者最初看到的是人物在文化感受上的迥异。所谓的文明人,如爱德华,崇尚实用主义,专注资产利益和物种资源的搜罗,在财富、知识和猎奇为目的的生活中,几乎没有真正以身心去体会自然的举动,更侈谈心灵的震动。海蒂是文化的质疑者和叛逆者,她早期关于欧洲前基督教文明的论文被视为异端。在与靛蓝的接触中,看到小女孩和教士、鹦鹉之间毫无隔阂的交流和情感传递,看到她对于理性的各种反应,海蒂颇有感触,自己也在慢慢改变。她在英国和欧洲的花园里,看到异于基督教文明的艺术品,甚至感受到了神奇的光,这些体验让海蒂对印第安人的感悟方式有了一定的理解,在重新审视自己与丈夫的关系时

意识到两人的差距。

小说中,海蒂的地域跨越最广阔,她在最后重新回到之前让她心情激荡的英国和欧洲,回到她认同的归属之地。她带回的花种在旁人眼里看似不符合实用价值,都是观赏性花卉,却展现着无用的可爱、无用的至高。

阅读《沙丘中的花园》,读者仿佛跟随人物进行了一次丰富的旅行。其中,靛蓝之前的生活经历,与印第安人遭受饥荒、侵略、残杀、疾病等灾难息息相关。起初,她对海蒂和爱德华心存芥蒂和防备。尽管她在旅行中体会到精英社会的生活方式,却依然忠诚于本土传统,渴望回家,回到往日的花园。随着旅行的回归,靛蓝终于回到了姐姐身旁,而海蒂满心不舍,在与靛蓝告别时,她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和价值,觉得从孩子身上获得了更多的领悟,开拓了以前相对褊狭的认知。

通过旅行,不同的物种呈现在眼前,而不同的观念也得以传播和变迁。旅行的隐喻遍及小说各处,人物在地域中行进,适应不同的社会、生活环境,带去不同的文化习俗;故事讲述将情节从叙述者传递到倾听者;花园种植则将种子从一处带往另一处扎根,进入另一种生态体系。爱德华、海蒂、靛蓝的跨国界和文化旅行,牵涉到各种文化的混合、交流、融合,甚至排斥过程。

小说篇幅广阔,共分为10个部分,由两条线索不停地行进。靛蓝和姐姐走的路线截然不同,靛蓝被迫接受西方教育,姐姐被送到了印第安保留区,两者都竭力挣脱束缚,不断前行。姐姐被关进监狱,与两个孪生姐妹相识相依。期间,盐与非裔印第安混血男子发生性爱,生下儿子,并独自抚养,同时等着妹妹的回归。印第安姐妹的离合,从幽灵舞蹈的仪式开始,也以舞蹈结束,两人最终在故土团聚。靛蓝将新的种子和希望带到了沙丘的花园中,期待着美丽的盛放。姐妹俩展开的旅程,是从一个共同点展开,最终又闭合在同一个点,形成了一个圆满的轨迹。在圆形轨迹中,海蒂参与了很重要的一部分行程,她们的旅行跨越了不同地区、种族、阶层、性别、价值观等。其中,海蒂和爱德华夫妇向东旅行,即从美国西南部的加利福尼亚,穿越亚利桑那、新墨西哥、堪萨斯、伊利诺伊,到纽约,而后跨越大西洋抵达英国,再从英国至意大利,不知是否作家有意而为,其行程恰好与欧洲人在美洲的殖民路线相反,包含某种特殊深意。相对应的,盐姐姐的路线,更像是人物在文化认同上的归属进程,内境的不断行进和深入。爱德华之旅,受到商业利益、社会政治的外部驱动,而印第安姐妹,包括后来海蒂的变化,她们在地理疆域的行进更多是由内心的疑惑、文化的交流和心灵的渴望所推进。

小说超越了读者对族裔写作的期待,它并不耽于揭示历史和现实中的族裔苦难和困境,而是更多从兼具现实和象征的种子传播途径和过程中,展现某种未来图景:即种子的移植与文化的交融渗透相似,成长和盛开并不受地区疆域的限制,它们的归属也并没有僵硬局促的划分。此间,最重要的生命因素是适应性和融合性,是不断传播和衍生。

从隐喻意义上,园艺包含着深入交融,关涉种子、水、土壤、气候、阳光、种植方式等,也是繁衍、变异、培育新品种的过程,

同时是人类与自然彼此信赖依附的重要表现。因此,作家的文化意图和观念被巧妙融入种子的传播和园艺,不着痕迹、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文化观念。

对海蒂来说,花园是精神庇护和诊疗的神奇之地,靛蓝与动植物的亲密无间,让海蒂看到了不同于自己认知系统的生存方式和态度。同样,靛蓝一路收集种子,将花卉和树种带回故土,也由此获得了生命的活力和信心。

种子的隐喻也衍生于印第安人对于性爱的态度。盐姐姐认为性爱是美好的,与任何人发生的肉体关系,都是和平友好的维持,如果怀孕,孩子就是受欢迎的新生命。盐姐姐对于发乎情的行为毫无羞愧,坦然自若。生命的诞生犹如种子的旅行和散播。书中有这样一段表述:“沙丘蜥蜴部落的母亲们不管与哪个男人有了身孕,都会将孩子生下来;母亲的身体将一切在体内转化。小孩子们会有不同的特征,肤色深浅不一,可他们都是部落后裔。与陌生人的性爱被珍视为有意而为的联盟和友谊。”

爱德华因伤病去世后,他们带回的种子依然顽强地生长扎根。这正好验证了印第安外祖母弗利特的话:“与植物和树相比,人类真是脆弱的物种。”种子的散播、存活、移植能力,在人物迁移中不断显现,它喻示着:强大的生命力在于不断散播和适应,在于和新环境的交融,在于开放的生存态度。

小说中,各个人物在迁移中,会遇到各种障碍,出现各种排斥。海蒂在旅行中渐渐明白自己与丈夫的生活理念和价值观完全不同,终于提出分手。海蒂和靛蓝的关系,从之前的欧洲之旅到海蒂被救助,是关爱施受的融合,在此过程中,海蒂排异了自己文化中的冲突因素,与爱德华等人的价值观渐行渐远,在与印第安姐妹的相处中,拓展了视野,更具有包容心。西尔科的这种文学叙述排异法与她的文化政治观相辅相成,她历来不主张大张旗鼓地抗争,而是希望在思想、情感、文化层面的潜移默化。面对美国本土族裔在漫长历史中不断被侵略、歧视、误解等情况,她在文学创作中的干预是内敛而有效的。

在小说中,父权社会的体制和系统遭到瓦解。拉古纳人生活在母系社会中,女性的话语和理性得到尊崇,孩子们更多倾听母亲的叙述,依赖母亲的养育。这与欧美主流文化在本质上是相对的,在作品中更有其艺术隐喻性,让读者在阅读中看到和听到不曾关注的细节,从而拓展自身的视野,摆脱文化局限。西尔科让坚韧果敢的女性承担更重要的文化传递和传承作用,与宗教和文化风俗发生更密切交融的关系。有学者甚至认为,她的小说超越了西方的人物套型,突出了女性的神性,将人物塑造为“思考的女性”。她们遵从自己的感受,不依附男性的强权,平等对待周遭的一切。这些文化上的表现,并非局限于性别差异和冲突,也是对多元文化语境的一种折射和文化建议。

这个漫长丰富的旅行过程,就是对文化嬗变和交融的推进,也是人们视域和思绪开拓的契机。它看似在表面移动游走,其实深入了内心,也早已超越了人们开卷之初期待的族裔领域。作品中,行进中的交融、交融中的前行,彼此相辅相成,从往昔映照当下,也指向了未来。

天涯异草

# 六角国里漫谈莫迪亚诺

□沈大力

法国人习惯称自己的国为“六角国”,每日见于报端。这个称呼源于法国领土在地图上呈六角形,似乎很少有中国人注意到这一特征。实际上,法国在文化上的确颇有棱角,在维护文化特性上敢于跟美国抗衡,国民争论起来锋芒毕露。鉴于此,当中国巴黎文化中心邀请我给法国人讲去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迪亚诺时,我犹豫不定。一者胡侃有“班门弄斧”之嫌,二则本知见解迥异,难美人之美。

1月20日,我还是不揣冒昧坐上了中国巴黎文化中心的讲坛,给法国听众做了一场题为《莫迪亚诺与中国》的文学报告。我先从莫迪亚诺分别于1977年写的《家庭手册》和2005年的《系谱》两部作品谈起,引出这位当代法国作家的“中国情结”,拉近与异域听众的距离。莫迪亚诺在小说《家谱》开篇中写他母亲:“这是一位不动情的年轻女子。未婚夫送她一只中国长毛狗,她不搭理,先后交付给几个不同的人照管,就像后来对我那样。中国长毛狗失落跳窗自尽了。我在两三张照片上看到了这条狗。应该承认,它此举深深触动了我,产生同命相怜之感。我也是只狗,貌似有个‘系谱’。”他还谈及自己祖父在巴黎卖中国瓷器的旧事。小说《家庭手册》里,莫迪亚诺更明确地表达了对中国的关注。“我”在一个小酒吧里偶遇一个名叫亨利·马利尼昂的神秘人物,用整整一章描述了我“与他的相识,要解通‘中国之谜’的曲折过程:

马利尼昂坐在我邻桌,要了点儿白酒,抿了一口朝男服务生抱怨:  
——这酒没有中国原味儿。

我突然向他发问:  
——先生,您了解中国?

我俩一直聊到凌晨4点,当然谈的是中国喽。二战前,他在那边居住过,至今还能在一张餐巾纸上画出上海的详图。那天晚上,他就为我画了一幅。我想知道的是,现今一个西方人能否深入这个神秘的国度,完全自由地探索一番。他犹豫片刻,郑重地回答:  
——我想这是可能的。您要跟我一同试试吗?

我说:当然啰!  
26岁上,马利尼昂由一家新闻社派往上海。他在上海创立了一份日报,用法文和中文同时发行。蒋介石政府联络部聘请他当顾问。他在华七载,返回法国后出版了回忆录《失却的上海》,表达对他度过青春的城市由衷的激情和怀念。1945年4月,他在柏林从户籍上消失,被认为人已亡故。

事实上,此君又在巴黎复活,重温起“中国梦”,跟莫迪亚诺商量如何一起启程访华。他从报章上认出自己昔日的中国挚友罗歇·符昇常在中国总理周恩来身边出现,顿觉有了门道。关键在于通过中国驻法大使馆重新跟老友取得联系。为此,他跟莫迪亚诺一同约见过去在上海的另一个老同事,如今在巴黎做珠宝生意的华人乔治·吴铿。《家庭手册》记录下他们的谈话,莫迪亚诺陈述道:

马利尼昂立即向对方说明,我们正在规划去中国游历一趟,需要尽快跟人民中国在巴黎的大使馆联系上,看他能否有内部渠道。

——当然啦,不过,我认识人民中国大使馆的人。不过……不过……  
乔治·吴铿停下口,仿佛故意要让我俩着急。

——不过,要跟他们谈起你来,那事情就会很困难……我需要见到一位常务秘书才行。不过,我的老兄,你得明白,现今的人民中国可跟咱们过去认识的中国迥然不同了。

马利尼昂回应道:  
——这个自然。  
——我跟大使馆一位商务专员有些关系。

吴铿说着,盯着我们谈话处的窗户和最靠里的地方看,好像在目逐一只翻飞的蝴蝶,然后转头问马利尼昂:  
——你为什么偏要再回那边去呢?

见马利尼昂不答腔,他干脆说:  
——老兄,你会什么也认不出来的!我们将吴氏送到伊埃纳林荫道的出租汽车站。临别时,他对我们说:  
——我会给你们打电话的。要耐心,多些耐心。

“我”跟马利尼昂感到是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似乎过于乐观了。最后,莫迪亚诺写道:  
马利尼昂为何想再去中国呢?他对我说:“期望找回自己的青春”。对我来说,那可是天涯海角呀!我想去那边扎根,安下一片乡土家园,找到自己缺少的一切。

如莫迪亚诺所言,他是要去西藏翻山越岭,到香格里拉的寺院领会中国智慧的奥秘。小说《家庭手册》长达400页,谈这场“中国梦”仅有10页。尔后的部分里,再也不见马利尼昂和乔治·吴铿的踪迹,显然是他的企划最终落空了。

作为小说家,莫迪亚诺的名声在获奖之前就广传播过。《百花文艺出版社》于1986年就翻译出版过莫氏的小说《暗店街》。1990年,我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就指导了关于莫迪亚诺创作艺术特点的法语文论。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年由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大型辞书《法国文学1980—2000》中对他也有专项介绍。迄今,他的《环形大道》《夜巡》《地平线》等十来部小说都有了中译本,这让当晚来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听报告的法国人感到欣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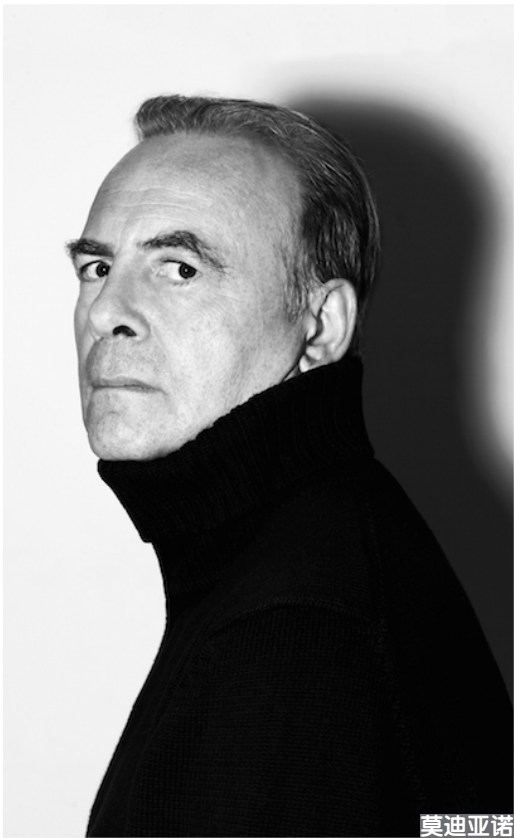
法国听众更想了解的是,莫迪亚诺的作品在中国读者心中的反响。前一阵,法国新任女文化部长在宴请莫迪亚诺时坦诚表示,自己连对方一本小说都没读过,情境十分尴尬。故而,我来跟法国人调侃这一话题前“接受教训”,又再看了他十几部小说,才登上讲坛。我把《暗店街》等几部小说跟乔治·贝莱克的《生活指南》和雷蒙·格诺的《蓝花》相比较,觉得他们写的都是“另类”小说,但小说叙事“支离破碎”,有些让读者如坠五里云雾。莫迪亚诺本人根本无意自省,重构事实,他说:“我真的不是在写传统意义上的小说,而更倾向于罗列一些未经推敲的事物、各种遐思,属于想象范畴”。他举例说明自己的写作特征:“一天,我找到十三三少年时的一段记事,说自己想试着写点儿什么,把《大摩伦》与彼得的黑幕小说掺和在一起。起点是孩提模糊的时刻,早先生活在塞纳-瓦兹省,当年还是一片乡村景象的巴黎城郊那种岁月。周边有一座衰颓的古堡,让人想到阿兰·富尼埃的那部小说。我父母不在那儿,我住的

人家有点儿形迹可疑,氛围离奇”。

由此可以看出,小说完整的叙事结构对莫迪亚诺并不重要。他着意的是随意遐想的层面,要描绘割裂的、捉摸不定的、梦境里的过去。这正是他创作上独特的文学性。他在《家庭手册》里这样描写自己夜访童年时在塞纳河畔贡蒂岸住过的套房:“这一刻,蜂蝶舟出现,滑向小岛一端,将船上探照灯的华彩射到沿河大道边的屋宇上。套间的墙壁顿时流光溢彩,折射到天花板。20年前,就在这同一卧室里,我和弟弟鲁狄熟悉这种飘忽不定的影儿。每当这一种蜂蝶舟驶过,我们灭灯之时,它们就会浮现,那么令人着迷。”他又回忆起1945年5月一个傍晚的情景,写道:“塞纳河堤岸和卢浮宫都浸入辉煌的灯火。一群人涌到河岸上和绿趣花园里。下边,在贡蒂沿河大道的延伸处,人们一下聚合,组织起了风笛舞会”。

在莫迪亚诺笔下,昔日的巴黎时尚重现,与弗朗索瓦·萨冈的小资情结不同,也是我上世纪70年代末来巴黎曾经体验过的,故读起来很欣赏彼时一种民风淳朴的情趣。时过境迁,今朝来巴黎光顾“红磨坊”和“丽都”的中国游客就未必能有此亲切感受。相当多的中国读者脱离一定的历史氛围,不了解法国人的社会人际关系,读起莫迪亚诺的风情笔记小说来,完全可能觉得清淡如水,乏善可陈。我的一位朋友冲着诺贝尔文学奖踊跃去买三四册莫迪亚诺的小说,阅毕大失所望,言言他的作品“没啥意思”,其原因概源于此;这也是我要如实告诉法国听众的。莫迪亚诺的作品跟阿兰·罗伯-格里耶式的先锋派不同,但毕竟也是一类“新小说”。

目前在中国泛动的一小股莫迪亚诺热,是与“诺奖效应”分不开的。莫迪亚诺倒是个从不追名逐利的人,作品不拘俗尚,尤其不出卖色相。他得知自己意外获得201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时竟称之不为“怪事”,“觉得被人分身了”。他的文笔并不顺从意识的流势,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无涉。他描写二战时巴黎黑市人物,并非出于过来人“回忆的责任”而为。他本人出生于1945年,没有经历德寇占领时期,小说里的素材是从旧报纸和诸多文献上查抄来的,“纯系想象中忽闪的一颗颗远方



莫迪亚诺

星辰”。诺奖的的确给莫迪亚诺这位崇尚真实的作家添上了一轮超现实的光环。伽利玛尔出版版权转让负责人安娜·索朗日·卓布勒在法兰克福书会就遇到这种情景。她惊叹:“人们简直闹疯了!他们都盲目出价,甚至连莫迪亚诺一本书都没有读过。”对中国读者来说,肯定会遇到一个文化差异和不同阅读习惯问题。没有相当关于法国的历史、地理和社会文化知识,就难以进入一个特殊的“莫迪亚诺境界”,因而也就无法像法国人一样感受那种文学氛围。再者,一般中国读者看小说喜欢其中有吸引力的故事,可莫迪亚诺不屑于编造有连贯性、富于悬念的新奇故事情节,而着重自己同胞日常生活的“流水账”,奏的是“小调乡土音乐”。

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的讲坛上,我想向法国听众表明的是,对中国读者来说,“莫迪亚诺境界”里描述的是异域风光,而差异恰是一种有距离的审美情趣,能够丰富不同民族之间的跨文化对话。